

一 船户后裔

天津濒临渤海，九河下梢，水网密布，自古以来有许多地方以“沽”字为名，据说有 72 沽，实则仅有 21 沽。其中大沽为海口重镇，亦是北方著名的渔村和盐场，而其早年则土地盐碱，草木不生，居民多以织网捕鱼或“煮海为盐”谋生，生活极其艰辛，故有“花儿寨”之称（“花儿”即“叫花子”）。民国政坛风云一时的第八任大总统曹锟就于 1862 年（咸丰十二年）出生于这里。

是年，正是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陷天津之后的第二年。天津陷落期间，“外郡之商，早已卷资星散，本郡之贾，亦经运货遁逸”，联军在海口、海河抢掠商船粮船，使南来商船不再驶入；加上连年蝗灾四起，“在地青苗，全行食尽”人祸天

灾，造成天津地区“难民载道，甚至乞丐无门”^①的伤惨景象。而大沽位居海口，连遭联军三次洗劫，凄景则尤甚。

农历十月，时值北方最寒冷的季节，海、陆两股寒流不时交相袭击和扫荡大沽这一滨海小镇。二十一日黎明，东大沽船工曹本生家里又一个婴儿呱呱坠地。曹年迈的母亲望着窗外四日来连降数尺厚的积雪，饱经风霜的脸上顿时布上一层厚厚的阴云，内心有说不出的苦涩。只见她缓缓地翘起已显得异常僵化的指头，默默合计了一下，便知该年为壬戌年，这孙子是属狗，想到这兵荒马乱，生活难以维系的动荡年代，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咳，大冬天，又来了一条穷狗！”

这条“穷狗”便是曹锟。曹锟的祖母，甚至他的祖祖辈辈恐怕梦里也不敢想象正是这条“穷狗”，居然在 62 年后登上了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成为民国政治史上为数不多的几位总统，权倾天下，显赫一时。曹锟由一介平民爬上总统宝座的历史瞬间，尽管犹如过眼烟云，来亦匆匆，逝亦匆匆，却给世代代生活贫困的曹家带来了料想不及的荣华，使曹氏家族名噪一时，富贵一世。自此，曹氏家族的命运便与曹锟的命运紧密地纠结在一起，其盛亦彼时，衰亦彼时。

曹家祖辈究竟由何地何时迁至大沽已无法稽考，但从资料表明，至少曹锟的祖父就是东大沽的渔户，而到其父曹本生时则成为修理船舶的船户。曹本生，为人憨厚老实，目不识丁，木工手艺却十分精湛，终生以造木船为业，谋取生计。他家境贫寒，却有一个子女众多的大家族，依靠手艺养家，也仅能勉强糊口度日，以致于他的妻子，除料理家务，照顾众多的小孩外，有时还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 1 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年版，第 488 页。

不得不从那些光棍船工中揽些针线活，缝补浆洗，赚点零钱，贴补家用。

曹本生育有五男两女：长子名镇，次女名大姑，三名锬，四名锐，五名钩，六女名二姑，七名镞。

曹本生生性耿直，为人要强。纵然生活异常艰苦，他总是勒紧腰带，咬紧牙关，拿出尽可能多的节余让孩子们读点书，识些字，多种谋生的手段，以致曹氏兄弟大多在幼年时读过几年私塾，为他们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曹氏夫妇何时而终，是在曹锬发迹过程中抑或为其发迹之后？如何安度余年？无论曹氏家族还是历史都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资料来回答这些问题，至少在目前还没有看到或找到。

曹镇，字馥庭，早年即随父学习造船技术，甚为勤快，是曹家维持生计的好帮手。待其三弟曹锬发迹后，则弃其本业，依仗权势，在天津海口一带专事田产掠夺，并在大沽开设当铺，经营房地产，欺男霸女，乡人畏之如虎，成为塘沽等地集地主、商人、恶霸、豪绅为一体的赫赫有名的大财主。其育有两男，长子名士魁，字星阁；次子名士房，字少庭。

曹锐，字健亭，幼时在大沽钰盛号米庄学习做生意。曹锬发家后，即弃商从政，先后出任天津县清乡局长、迁安县知县、候补道、直隶藩台等职。1917年，曹锬任直隶督军后，又保荐其为直隶省长，兄弟二人共掌一省军政大权，任职数载，贪赃枉法，声名狼藉。第二次直奉战争期间，出任直系军需总监，北京政变后为冯玉祥国民军囚禁，即吞食鸦片自杀。在曹氏兄弟几人中，他最得曹锬信任和赏识，曹锬不仅把自己的家产、现金托付给他，而且许多军政大事都要与他商计或委诸于他。曹锬未得子之前，曹锐把自己的独生子曹士藻过继给曹锬，改名为少珊，直到1918年曹锬得子后，少珊才得以归宗。曹士藻又育有一子，

名继周，字郁文。

曹钧，字秉权，早年在大沽美孚油洋行当大写。曹锟出任直隶督军时，他被举为安福系国会议员，后又任天津证券交易所董事长以及同福饼干公司、北方航业公司董事长。其育有四子，长子名士杰，余无闻。

曹锬，字子振，清末秀才，后入北洋陆军测量学校学习，先后出任陆军测量局局长、陆军第 26 师师长等职。其育有一子，名士骧，字少振。

曹锟，字仲珊，在曹氏兄弟姐妹中排行老三，人亦称曹三。其育有三男三女，三男为：士岳（字幼珊）、士岱、士嵩；三女为：士熙、士贞、士英。曹士嵩又育有一子一女，子名继信，女名继怡。

曹大姑、曹二姑无闻。

就是这个船户出身的贫苦的大家族，在民国初年至 20 年代变为权、财、势倾天下的豪门贵族，其兴盛衰落的近乎传奇般的故事正是从曹锟发迹的真实历史开始的。

二 弃商从戎

曹锟少时，曾被十分好强的父亲曹本生送入家乡私塾读书，其父虽不敢奢望他有朝一日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却也期望他能学到一些为人处事的道理。曹锟也很能体察父亲的苦心，学习非常刻苦，不仅练得一手好字，而且粗通经史，但终因家道贫寒，

这种学业仅维持了 4 年就不得不中止。就是这一点学识却为他后来的发迹打下了基础。

曹锟失学后，因年少，一时无事可做，加之父母良善，经常遭受本地渔霸、恶棍的欺负和凌辱，他便利用自己腰宽膀大、体格强健的天资，开始练习武术，以为父母伸屈报冤。这期间，他舞棍弄棒，天天练习，没有丝毫懈怠，竟练出一身好拳脚。正是这身拳脚使他逐渐染上了一些恶习，并与天津葛沽一带的无赖混混刘得胜纠合在一起，整日游手好闲，滋事生非。^①据传说：有一次，他路遇一位江湖术士，即令为其占相。这位术士见他虎背熊腰，甚感畏惧，既为讨好他，又为自己骗点钱财，便信口开河，美言有加，声称：这位少爷天庭饱满，地仓殷实，将来必定官至县令。岂知曹锟此时认为这是有意嘲弄自己，顿时大怒，饱赏术士一顿拳脚，直打得那术士面色发青，口吐浓血，倒地翻滚不已。

曹本生夫妇看到此子如此不争气，倍感伤心，待曹锟长到 16 岁时，决定让他随父亲和哥哥曹镇学习造船修船技术，既为约束他的不良行为，培养他向上进取，也为让他日后依赖祖传手艺娶妻养家，但曹锟并未能遂其父愿。接着，曹氏夫妇又让他学做农活，安分守己，务本为生，曹锟则更是死活不肯，其父不得已只好顺从曹锟的意愿，让他去贩布卖布。曹锟之所以要坚持贩布卖布，弃祖业而经商，是因为天津地区商业发达，是北方最大的通商大邑，民间在近代以来重商习气很浓。尤其是 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迫使晚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条约规定天津开埠通商，外国商品像洪水般地从此

杜春和等编：《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年版，第 245 页。

里入口，尔后散流各地，中国原有的家庭织布业纷纷破产，洋布的市场容量迅速扩大。贩布卖布在此时确实是一种很有远见且顺乎时宜的谋生手段。看来，曹锟绝非一个像他祖辈那样墨守成规的人。

曹锟贩布初期，因家境拮据，只得肩挑手提，走遍大街小巷，到处叫卖，十分辛苦。到后来他赚了些钱的时候，就买了一辆独轮手推车，往返于天津城与塘沽之间，生意甚是兴隆，其原因在于他常常能大而化之，不过分计较价钱，也不三番五次地索讨欠帐。这对于那些手头不甚宽裕的贫苦购买者来说很中意，以致于他的生意不仅数年不垮，而且主顾越来越多，虽取绳头小利，生计倒没有什么问题。曹锟也由于采用这种经营之道，时人中有人称其为“傻子”。可见，当时世道人心已是淡薄。

星移斗转，岁月更替，曹锟贩布一晃就是三、四年。这时候，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的加深，天津成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大肆侵略的重要据点。英、法、美等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在天津强行划定租界，设立领事馆，控制海关，开设银行、商店，建立教堂、医院、学校等，从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各个方面进行侵略。特别是一系列的经济侵略活动，如掠夺原料，倾销商品，造成了整个天津地区城市衰微，农村凋弊，广大人民群众对商品的购买力锐减。曹锟从事小本经营，本钱小，获利也少，加之随挣随花，无法扩大经营，在实力雄厚的外国垄断资本和本国的买办资本排挤下，最终蚀本歇业。这年，他还不到 20 岁，穷困潦倒，无以为生，在津门流浪长达半年之久。

1882 年春，李鸿章经营和赖以起家的资本——淮军在天津招募新兵。某天，一直为穷困、饥饿所困扰的曹锟喜逢一位贩布时结识的朋友，朋友告诉他：“天津正在招兵，你若补上了缺，除了衣食住行，公家全管，一月还有四、五两饷银。”曹锟惊喜

异常，联想到自己贩布卖布的时候在保定受辱的情形，决定从军当兵，这样既可度过此时的困境，又可了却自己多年来的一桩心愿。早先，曹锟曾推车贩布到达直隶省府保定，刚入城门，就被守城的士兵拦截，遭受百般刁难，不仅不让进城，还饱尝一顿拳脚，车上布匹也被扯乱散落满地。曹锟平素贩布，生意火热，自鸣得意。现在无端受辱，怒火满腹，却也无可奈何。经历此事，他总想自己寒来暑往，备受艰辛，还是无法摆脱吃苦受累的命运，开始向往吃粮当兵的威风。从那时起，他暗下决心，立志从戎。这是曹锟投入行伍之前的一段小波折。

在中国社会，从军当兵一直受着一种强烈的传统观念的约束，有道：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这种观念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思想中，但中国历朝历代还是保持了庞大的军队。当风调雨顺、社会安定，人们经济条件较好时，这种观念的束缚可能会有效地阻止人们去从军当兵，但情况相反时，军队则又常常成为人们谋生的唯一出路。一位外国学者如此分析：

在中国社会中，军队的主要职能，是为想改进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人们提供选择的机会。但他们懂得，低下的地位、职业和能力，并不能常常带来成功。

1882年，正是大清光绪八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中国已逐渐沦为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半殖民地，社会经济迅速破产，农村凋零，城市衰微，民穷财竭，已非鸦片战争前自给自足

① F·H·默顿 (Freid·H·Morton)：《中国社会中军队的地位》，《美国社会学刊》第57卷第4号，1952年版，第349—350页。

的自然经济了。人祸天祸，接连不断，人们过着与死亡为伴的生活，经济状况恶化至极。各种战争频仍，国难当头，军队需求比往日更为急迫，加之晚清中央政权的削弱，地方主义势力的滋长，私人武装的兴起（如曾国藩、李鸿章组织的湘军、淮军以及后来袁世凯编练的新建陆军，等等），数目可观的军队需求给越来越多的经济上贫苦的人们提供了更多的求生机会。假若一个人在家里务农，他在经济上得到改善的机遇可能接近于零；假若他去从军当兵，即使薪金有限，仍可寄一部分回去养家。总之，一个士兵的经济状况要比一个普通的农民强得多。^①这种现实，既影响了人们通过参军求生的观念，也相当地影响了普通士兵在军队中寻找机会的思想，因为他们发现了低贱的社会地位并不是他们职业的主要障碍。同时，军队私化倾向的增长，其首领必须支付士兵们薪饷，否则就无法控制自己的军队，甚至招募士兵愈益以支付多少报酬作为条件，况且许多军队将领又是从最低层的普通士兵晋升上来的，这对普通的人们和士兵的刺激性更强。但无论军队将领还是后来的大小军阀其出身如何，绝大多数是从正规军开始他们戎马生涯的。^②

那位热心的朋友给曹锟指出一条明途，曹锟在兴奋之余，未及道谢，便赶忙说：“朋友帮忙就要帮到底，你好歹也得借给我些零钱，让我饱食一顿，好去投军！”曹锟平时对朋友很讲义气，故而那位朋友痛快地陪他去饱餐了一顿，临走时又送给他不少碎银子，并反复告诫他：“你给我好生记住，这里是将相王侯升起的地方，关系你一生的前途命运。一旦你被选中，应多做事，少

（美）齐锡生著，萧延中、杨云若译：《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年），第79—80页。

参见〔美〕薛立敦著，丘权政等译：《冯玉祥的一生》，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1页。

说话，不论吃什么苦，你都必须挺得住。有言道：‘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曹锟因昔时习武，体格魁梧，很得当时募兵的淮军管带郑谦赏识，即被选中入伍。自此，开始了他的行伍历程。

曹锟入伍后不久，因粗通文墨，写得一手好字，就被淮军首脑李鸿章的健将郑谦青睐并收为“义子”，他也借便常常去“义父”家里干点私活，叙叙家常，培养感情。每逢过节，他必备一份厚礼前去孝敬“义父”大人。同时，他对于公事也很勤奋，又庸弱、温顺、忍让且吃苦耐劳，遇事争先，在长官和士兵中间印象极佳。转眼间入伍已是三年，郑谦经过长时间的察言观色，认为曹锟憨厚老诚，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准，不像其他士兵那样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为人自私，遂将自己的独生女儿许配给他。这就是曹锟的正室夫人郑氏。还有一种说法是：曹锟 17 岁时，父亲曹本生见他不成器，托人说媒，将西大沽一姓郑的贫苦人家的姑娘娶为妻。郑氏长于曹锟两岁，相貌平平，但性格温顺，为人知情达理。过门后上敬公婆，下疼小叔小姑，友爱邻里乡亲，对曹锟百般体贴，小夫妻和和睦睦，郑氏因此在曹家很有威信。

1885 年（光绪十一年），当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洋务派人物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天津武备学堂”，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所陆军军事学校，教授西洋枪炮、土木营垒、行军布阵以及攻守之法。学堂最初设于天津水师公所内，学生由淮军各营选派，经考试后，择优录取。其中如有文职人员愿习军事者，亦量才录取。该校聘请法国军官多人担任教习。学生名额最初开办时仅 100 人，待后来学堂移至杏花村对河唐家口旧柳墅行宫时，也没超过 300 人。学堂教育在军事上采用外国行军新法，学习外国军事操典，但在思想教育方面却规定忠君尊孔，禁止一切进步思想，这与当时流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这座学堂为清政府训练新式陆军培养和储备了大量人才。

淮军同湘军一样，既是地方军队，也兼有私人武装的性质。因而选拔下属军官的主要标准是对首领个人的效忠程度，入选的军官又以同样的标准来选拔对他们效忠的下级，依此类推，直至普通士兵。士兵对其顶头上司的忠诚，使其头领具有绝对的权威，他们只忠于头目，而不是中央政府，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效忠的等级集团。正是由于这种因素，李鸿章在 19 世纪 60 年代初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过程中编练的淮军，不仅后来居上，人数超过他的老师曾国藩编练的湘军，成为一支最强大的地方兼私人武装，而且差不多到 19 世纪末，仍然是中国最强大的军队。^①

天津武备学堂创办和招生的消息传出后，全军上下，一片轰动，个个都渴望得到长官的推荐和提携，以跨入这座升迁之门。因为每个士兵以及下级军官都晓得谁进入武备学堂，谁就是将来戎装辉煌的军官。武备学堂成立初期，除原则上公开考试招生外，还要选拔少量的优秀士兵，入校肄业，以使他们有深造的机会，并激励士兵奋发进取，为长官尽忠尽职，维系淮系集团的发展。对选中的士兵来说，即可改变自己一生的命运，获得求取“功名”的机会。武备学堂第一期招生仅仅百人，选送的士兵则少得可怜，选择的标准自然是淮军传统的选兵选官原则，也就是那些对长官最效忠最亲近的士兵。曹锟既是管带郑谦的“义子”和将来的乘龙快婿，又能识文断字，善领长官意旨，在全营官兵中印象较好。再加上他谄习世事，颇有心计，终于博得郑谦保荐，顺理成章地成为该学堂的首届学生。

进入天津武备学堂的曹锟深知学习成绩与自己将来的前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吃苦耐劳，发奋进取，以致于军事训练和枪弹操作根本不在话下。就是他原本不在行的军事理论也凭着自

参见斯佩克特著（李鸿章与淮军）一书。

己的勤学好问，善于钻研，均能一一攻克。在同期学生中，当时就有许多出类拔萃的人物，曹锟竟能后来居上，逐步跻身于后来被称为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之列。^①说明曹锟绝不是世人所说的仅仅一介赳赳武夫。

1890 年，李鸿章亲自主持了武备学堂第一期学生的毕业考试，曹锟名列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段芝贵、陆建章、王占元、雷震春、张怀芝之后；李纯，蔡成勋之前，为优等生，均被李鸿章上奏朝廷，饬令回营担任教官。李鸿章所举诸人，皆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特别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坛军界的显赫人物。曹锟毕业后，被分配到淮军提督宋庆的毅军中担任下级军官——哨官。这样，他经由一名普通的副兵而入武备学堂，再入军官的行列，一步一步地迈出他军事政治生涯中重要的步伐。武备学堂的学习则为其最关键性的一步。

三 投袁发迹

1894 年（光绪二十年），朝鲜爆发全琫准领导的甲午农民大起义，清政府受其属国朝鲜王国之邀，派兵渡过鸭绿江，帮助镇压起义。同时，清政府根据 1885 年（光绪十一年）3 月 4 日签

时人也形象地称这三人为“龙”、“虎”、“狗”。王士珍为河北正定人，在政治舞台上时隐时现，不与人争官争是非，人们谓之“龙”；段祺瑞为安徽合肥人，秉性刚强，争权夺利，从不让人，人们称之为“虎”；冯国璋为河北河间人，为人庸俗，嗜财如命，人们称之为“狗”。

订的中日《天津条约》，^①将出兵事宜照会日本政府，说明中国出兵系应朝鲜之邀。清政府原估计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议会将阻碍政府的出兵请求，岂知时任首相的伊藤博文断然解散议会，出兵朝鲜，并大举增兵汉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闻讯，乃知中日大战不可避免，除指望帝俄出面调停外，也增兵朝鲜。7月23日，日本军队突然进攻朝鲜王宫，劫持了国王李熙，并扶植起傀儡政权。同时不宣而战地进攻驻扎牙山的清军，甲午中日战争由此爆发。

战争爆发后，曹锟随提督宋庆赴朝参战，无奈宋庆早为湘军系统，在淮军中资望甚浅，既非善战骁军，又胸无韬略，其他各路将领根本不听从其指挥。他在大敌当前，竟易攻为守，结果是去亦匆匆，溃亦匆匆，一败朝鲜，二败辽东，李鸿章经营了三十余年的淮系集团被东洋弹丸之国打得大败。操执清政府实权的慈禧太后痛惜淮军之失，万分难过，不管主和主战，情势已成骑虎，不得已再起用湘军老将魏光燾、李光久等人招募新兵，北上拒敌，同时还派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湖南巡抚吴大澂和宋庆协同督办征东事务。其结局是先有魏光燾在牛庄全军覆灭，后有李光久弃军潜逃，继则吴大澂逃回关内。腐败的清政府无心也无力再战，被迫在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17日签署了蘸着中华民族鲜血的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甲午战败是晚清政府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也是中国近代史上重要的一页。经过此战，湘军既成陈迹，淮军也已覆灭，举国上下痛感无可战之兵，一旦再有洋兵入侵，则只能束手待毙。在此之前，清政府虽然一次又一次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却无亡国之

该条约议定条款3项：（1）四个月内中日尽撤驻朝军队；（2）中日两国均无须派员帮助朝鲜训练军队；（3）遇有重大事件，中日两国若派兵赴朝，应先互相照会。

忧，极力培养重文轻武风气，沿袭明代，以八股文为主要内容的科举制度一如既往，继续施以种种愚民政策，使人民停留在萎靡的境地，以利巩固它的专制统治，自我陶醉在“天朝独尊”的狂想曲中。结果连替它卖命保天下打击太平天国革命和各地农民起义的湘淮二军如今都免不了“兔死狗烹”的命运。

《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政府朝野人士痛感日本以一新兴小国竟一跃而起，成为头等强国，同中国仅仅一衣带水，乃不能不感到亡国的严重威胁，于是“整军经武以救危亡”的呼声此伏彼起，不绝于耳。为了加强对内控制和抵御外侮，清政府不得不从事军事制度的彻底改革和新型陆军的编练。

新型陆军的建立，为曹锟由下级军官由上擢升提供了便利的捷径。

1894年11月，甲午战争尚未结束，清政府就成立了专门督办军务的机构——督办军务处，命令两江总督张之洞首先在南方的吴淞督练自强军，即南洋军，聘用德国教官，仿效德军体制。不久，又命令广西按察使胡燏棻招募新兵4750人，在北方的天津小站成立“定武军”10营，即北洋军，也聘任德籍教官。这是清政府采用西法训练新军的肇始。

1895年10月，“定武军”尚未招募足额，胡燏棻又调任芦汉铁路督办，清政府“督办军务处”大臣荣禄、李鸿藻、翁同龢等人遂保荐了一位所谓的“知兵”大员袁世凯接管“定武军”的编练工作。

袁世凯，生于咸丰九年（1859年）八月二十日，字慰廷，别号容庵，河南陈州府项城县人。他的叔祖袁甲三，早年于安徽办团练，以镇压捻军起义发家。因有功于清王朝，被提升为淮军将领，最后官拜漕运总督，袁家便与淮系集团紧密结合在一起。袁甲三的子侄袁保桓、袁保庆、袁保龄等也都以“从军有功”，

个个爬上了高枝儿。袁世凯本是袁保中的儿子，因袁保庆长期在外征战，年逾四十还未得子，袁保中遂将袁世凯过继给他的叔父。袁世凯少年不学，只好效法先人从军求取功名。1881年，投奔与袁家具有密切关系的安徽著名绅士，著有“国士”之称的吴廷香（字奉璋）的儿子，时任淮军提督吴长庆。1882年8月，朝鲜发生“壬午政变”，同清政府具有“宗藩关系”的朝鲜邀请清政府即派吴长庆率部前往朝鲜，袁也以主持“前敌营务处”随军同往。袁一去就是12年，期间，头角渐露，赢得了“勇敢”、“果断”、“知兵”、“谙习外交”的美名，得到了淮军首脑李鸿章的赏识。

袁世凯取代胡燏棻编练新军的工作之后，立即在小站成立了“新建陆军督练处”，将“定武军”更名为“新建陆军”。并派人分赴淮、徐、鲁、豫、奉等地选募壮丁，购买军马，将兵员招足7250人，设步、炮、工、骑四个兵种，主要以步军为主，分编为左右两翼共计五营。袁世凯又参照曾国藩、李鸿章早年编练湘、淮二军的办法及德国军制，拟定了《练兵要则十三条》、《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及《募订译员合同》。聘请德人、日人、美人为军事教官，而以德为主，军队训练洋操，采用外国武器，开始了清代军队编制近代化的序幕。也为自己制造了一个登上政治舞台，呼风唤雨，培植自己势力，取清王朝而代之的恰当契机。

这支军队人数虽然不多，但在当时的中国只有张之洞编练的自强军在装备和训练方面能与之匹敌，其余各省督抚建练的新军均不能同它相提并论。因此，崇信“有军则有权”的袁世凯把它看成了自己的命根子。他清楚地看到，若要在黑暗腐败、尔虞我诈、倾轧激烈的政治舞台上站住脚，一步一步向上攀登，必须拥有雄厚的资本。对他来说，只有这支新建陆军才是货真价实的政治资本。清政府对他非常重视，如能训练好新军，使之达到维持

清王朝统治的作用，他就有了飞黄腾达的保障。所以，他一接管军队，即将全部心血灌注进去，事无巨细，靡不亲躬，下决心训练掌握好。

组建何种新军班底对袁世凯是至关重要的。袁世凯采用西法训练新军的军事技能，却用先前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督抚用于控制军队的精神枷锁——封建的旧思想、旧道德维系新军的精神，军官们必须对其效忠。袁还极力在士兵中间灌输对其个人效忠的思想，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①他对选拔的部将是否对其忠诚这一点极为重视，用人审慎，意在培植依附于自己的势力。他很少任用归国留学生，由于他们所接受的外国训练、他们的出身，很难将他们拉拢到自己的周围。所以，他选拔的将领，除自己的“家兵家将”外，主要以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和淮军旧将为主。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大都掌握一定的近代军事知识和技能，由于长期在军队中担任教习，而没有军队指挥实权，又为淮军旧将“漫语姍笑”，袁世凯很了解他们想升官发财的迫切心理，便把这部分人延揽到自己的军中效用。至于选拔行伍出身的旧兵旧将做干部，是因为袁世凯认为他们虽没有掌握新的军事技术和知识，但他们头脑简单，盲目服从，“忠诚可靠”。由此可见，袁世凯在将领任用问题上是用奴才而不是用人才，其练兵的目的也就大打折扣了。同时，北洋新建陆军应是继淮军而起的封建军事集团，绝非另立炉灶。

曹锟是天津武备学堂第一期出类拔萃的毕业生，毕业后仅得一毫无实权的教习职务，一晃数年却没有任何升迁，很有怀才不遇之感。恰逢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大量延纳武备生，于是满怀信心地怀揣学堂毕业证书和毅军委任状，前去投奔袁世凯。很快被

委任为步军左翼第一营帮带。旋即，又升为学兵营统带兼督操营务处提调。但他并不甘心于此，时时寻机登高。他听说天津宜兴埠有一位退职的清军提督，姓曹名克忠，人称“曹大帅”（其人曾任清末水师提督、陆军提督）。曹克忠在天津有钱有势，是曹锟顶头上司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的把兄弟，与袁家是世交。曹锟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遂备足厚礼，以同宗名义前去拜见，岂料这位“曹大帅”架子大，口气大，辈份也大，竟不假思索就认曹锟为其族孙。曹锟为了功名利禄，自然乐得其所了。自从有了这位同宗爷爷之后。曹锟的境遇就同以往大不相同了。后来，曹克忠的姨太太又向袁世凯疏通，使曹锟在袁世凯的心目中除了恭孝愚忠，并具有一定的军事才学的印象外，又凭空多了一层亲近关系，倍受袁的宠信。袁世凯向来以旧式师生关系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属下，从不假辞色，其属下无论是功名卓著的上将军还是普通的勤务兵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曹锟对袁世凯的为人本来就畏惧，每次挨责，自然而然地会胆战心惊，而这一点正好能迎合袁世凯“杀鸡儆猴”，驾驭部属的手法，因而很得袁世凯赏识。

清代官场有一种奇怪的风气：上级对谁客气了些，反倒让人提心吊胆，以为这是疏远见外；挨了骂，却洋洋自得，认为这是主子把他看作了自家人。这种风气，袁世凯在北洋军中着意培植，大加鼓励，以致于曹锟经常成为他巧妙宣传，极力塑造这种心理的工具。曹锟也因之不时升迁，官越做越大。

“戊戌政变”之后，荣禄受慈禧太后之命，统制北洋各军。他将京畿附近各军统编为“武卫军”，下设五个军，其中以袁世凯的小站新建陆军为右军，聂士诚的毅军（驻芦台）为前军，董福祥的甘军（驻蓟州）为后军，宋庆的毅军（驻山海关）为左军，另募一万人组成中军。五军中以武卫右军最精锐，最有实

力。其他各军（除中军参照新建陆军编组外）均由旧军改编，旧勇营的习气残留不少，组织散漫，编制不合，战斗力甚弱。

1899 年（光绪二十五年），反洋教反侵略的义和团运动席卷整个山东，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极大恐慌和仇恨。12 月 5 日，美国驻华公使康格照会总理衙门，肆无忌惮地要求清政府撤换山东巡抚毓贤，另派有实力镇压义和团的人士继任，即暗示由袁世凯接任。第二天，清政府就按照帝国主义列强的意图委任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遂将武卫右军带往山东，开始对义和团进行血腥镇压。曹锟随袁率部进驻义和团活动最激烈的地区之一——曹州府，任镇守使。曹锟对袁世凯的命令绝对服从，甚为卖力。他的部队开到哪里，就杀到哪里，当地一带的树上，挂满了义和团团民的人头。义和团在山东遭受重大挫折后，兵分两路，分途向天津和北京等地发展。

1900 年（光绪二十六年），帝国主义列强借口义和团排外，侵犯他们的利益，组织八国联军进攻京津。战争中，荣禄统率的武卫军五军前后中左四支几乎全部被消灭，唯有袁世凯的右军在山东未参战而得以保全，且有更大的发展。

袁世凯在山东的所作所为，深得中外反动势力的称赞，交口称其为“应变良才”。1901 年（光绪二十七年）11 月 7 日，李鸿章患病身死，其临死前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之右者。”力保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清政府即命袁世凯署理李职，袁自此成为权倾朝野的封疆大吏和各省督府的领袖，担负起拱卫帝都和处理外交的重大责任。

袁世凯率领武卫右军由山东赴保定（由于外国军队尚未撤出天津，总督衙门只好设于此）上任。不久，武卫右军改编为北洋常备军，曹锟被委任为步军第十一营管带，逐渐成为袁世凯的得力大将。1902 年（光绪二十八年），清政府选拔在京各旗兵丁组